

荆公新学研究

刘成国·著

第二辑

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荆公新学研究

王 立 著

三



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

第二辑

荆公新学研究

刘成国
•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荆公新学研究 / 刘成国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1

(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 第2辑)

ISBN 7-5325-4289-0

I. 荆... II. 刘... III. 王安石(1021~1086)—
哲学思想—研究 IV. B2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7396 号

《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第二辑

荆公新学研究

刘成国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240 1/32 印张 10.5 插页 4 字数 282,000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300

ISBN 7-5325-4289-0

K·809 定价: 28.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责任编辑 郭子建

作者简介

刘成国 (1977-), 男, 山东高密人。1994—1997年在烟台大学中文系学习, 大三时提前毕业, 获文学学士学位。1997—2002年在浙江大学中文系硕博连读, 获文学博士学位。2002—2004年在四川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工作, 主要从事宋代文史研究。现为副教授, 在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任教。

《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第一辑

- 唐五代江南工商业布局研究
- 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
- 慧琳《一切经音义》研究
- 《旧唐书》辨证
- 《越绝书》研究
- 欧阳修学术研究
- 敦煌密教文献论稿
- 唐代《老子》诠释文献研究
- 汉唐《史记》研究论稿

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 重点规划项目

学术委员会(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樟根 邓绍基 刘烈茂 许嘉璐 孙钦善
李修生 宗福邦 周勋初 袁世硕 章培恒
黄天骥 黄永年 葛兆光 董治安 曾枣庄
裘锡圭 阚延河

主 编:安平秋

副主编:杨 忠 曹亦冰

编辑委员会(按姓氏笔画为序)

* 方一新 卢 伟 安平秋 刘玉才 刘晓东
刘韶军 严佐之 李德山 吴景山 * 陈广宏
陈大康 张玉春 张希清 * 张涌泉 张鹤泉
杨 忠 周国林 * 周绚隆 * 姜小青 * 宫晓卫
* 赵生群 赵伯雄 * 赵逵夫 骆瑞鹤 * 高克勤
贾二强 顾永新 * 顾歆艺 黄仕忠 曹亦冰
董洪利 * 韩格平 喻遂生 舒大刚 * 程章灿
戴建国

(有*号者为常务编委)



总 序

《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是一套学术研究专著。它注重对中国的古代文献(包括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的研究和以古代文献为基础对中国文化的探求与思考。其中,有从古文献学的角度进行典籍、文献的专门研究,也有在古代文献、古代典籍研究的基础上,多方位、多视角地审视典籍,审视中国文化,探求典籍与文化的内在关系,探究它们的结合点。它立足于中国古代的典籍,立足于中国古代的文献,力求体现对古文献研究的特色,倡导一种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学风,并且提倡有新的切入点,有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推出有质量的,甚至是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

这套丛书是由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策划和组织的。作者队伍的主干力量是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联系的 25 所大学的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的教学、科研机构中的学者和若干家在全国有影响的出版社的专家。同时,也吸收全国各相关学科的学者的符合于这套丛书宗旨的学术研究专著。

这套丛书的书稿将在编委会、学术委员会和出版社分别审定合格之后分批推出。

承蒙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齐鲁书社联合出版这套丛书。在此谨致真诚的谢意。

《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编委会

2003 年 4 月 15 日



序

在当代青年学人中，成国博士虽然目前还“令名不彰”，但他的早熟已令诸多师友欣羨不已。孔子说“三十而立”，成国年方二十有七，便已身罩“博士后”、“副教授”等光环。这也许不能排除命运之神出于对他的偏爱而造就的某种机缘，然而，在我看来，他的学术生涯之所以能有今天的良好开局，主要还应归因于他的自强不息、锐意进取。

成国是我在浙江大学先后招收的三名“硕、博连读”的学生之一。他用五年的时间完成了硕、博士阶段的所有课程，并以优秀成绩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看起来十分顺畅；但局外人却很难得知他在这一过程中付出了怎样的艰辛！在如今的博士研究生中，颇有因种种“远虑”、“近忧”而用心不专者。“著书不为稻粱谋”，这当然是一种应该倡导的境界，但在当今的情势下，能够企及这一境界的，只怕已是寥若晨星。我无法确定成国的从学、治学动机是否有涉于功利，（事实上，我虽冥顽不灵，尚知“与时俱进”，并没有冬烘到完全排斥功利的地步，只是反对急功近利。）不过，他的“沉潜”，在我眼里倒是罕有其伦的。当“浮躁”成为一种时代通病的时候，要做到心无旁骛，是需要定力的。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成国恰恰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这种定力，于是，他也就能追步前贤，做到“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了。与青灯黄卷相伴的生活不免单调乏味，成国却甘之如饴，因为他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了沉潜于学术的快感。当然，这是要付出代价的。成国身材颀长，本有“玉树临风”之状，却因案牍劳形而略显清瘦。有时，也难免示人以一脸倦容，多少有损翩翩美少年的风采。但每次与其交谈，我都能感触到蕴蓄在其体内的充沛活力，从而总是不由自主地联想起李贺的诗句：“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



成国的博士学位论文以《王安石研究》为题,取精用弘,创获良多,受到了答辩委员会的一致好评。其后,他又不远千里,负笈成都,在四川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继续进行科研工作。呈现在读者眼前的这本《荆公新学研究》,便是他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修订而成的博士后出站报告。

宋代文人往往集官僚、作家、学者于一身,而王安石尤为显例。从政治的角度对作为官僚的王安石,以及从文学的角度对作为作家的王安石,人们审视已久、探索已久,但从学术的角度对作为学者的王安石,则还认知未深、论析未透。《荆公新学研究》聚焦于此,却又不拘囿于王安石其人其学,而由此拓展开去,将荆公新学这一北宋后期最大的学术流派纳入视野,进行综合研究与系统考察,对其形成原因、成员构成、代表著述、学术建构、盛衰历程以及对宋代学术思想史的影响等诸多方面,逐一予以深入探讨和详细考释。作者没有满足于将前人及今人业已取得的认识加以系统化、逻辑化,而力图借助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获致出乎前人及今人视野之外的独到见地。在研究过程中,则注意融合旧学新知,从而既避免了由于旧学不足所容易导致的天马行空、游谈无根的弊病,又避免了由于新知匮乏所容易产生的画地为牢、局促一隅的阙失。当然,其学术价值如何,还有待于同道评判。我无意强作解人,误导读者,而只想肯定一点:作者是热爱学术、并有自己的学术追求的。

《荆公新学研究》是成国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它的出版意味着刚刚“出道”的作者被推向了新的学术起点。此前一帆风顺,自然有助于作者树立学术信心,但在学术道路上跋涉,不可能尽履康庄,有时也会遭遇崎岖的羊肠小径,对此应有充分的估计。我相信成国的学术潜力,也不怀疑他的学术毅力,希望他以本书的出版为契机,倍思奋励,精进不辍。

肖瑞峰

2005年2月



绪论

清代全祖望站在程朱理学的立场上,以理学的发生、发展、壮大为基本线索来描述宋代学术史,从而将王安石视为异端而列荆公新学于《宋元学案》之末。但揆之史实,从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开始,以王安石为首的荆公新学不仅“六十年间,诵说推明,按为国是”^①,而且几乎统治了整个学术界,风行天下六十余年。士人“专意王氏之学,士非《三经》、《字说》不用”^②,“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③,其影响远在当时的伊洛之学上。南渡之后,新学日益没落,理学则逐渐蔚为大宗,但荆公新学对于学术史、思想史的影响却并未由此消歇。恰恰相反,甚至于南宋理学的兴起,都始终与对荆公新学的反动紧密相关。可以说,在整个宋代理学的发展历程中,以王安石为中心的荆公新学始终是作为宋代理学家们所无法回避的“他者(the Other)”而存在。只是,由于北宋政治改革的失败和国祚南移,熙丰变革的魁首王安石及其门人等便成为南宋士大夫的众矢之的;而曾经使北宋士人望风景从、趋之若鹜的新法理论基础“荆公新学”,从而也备受抨击指责,传承少人。及至南宋淳熙以后,程朱理学由社会边缘话语逐渐占据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更是对早在北宋后期便与其势如水火的“荆公新学”进行了口诛笔伐。于是,风行北宋中后期六十余年,对当时学术、思想、政治的一举一动均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荆公新学”,遂被深埋在理学话语所建构的历史深层中。后世在追溯有宋一代政治文化的变迁时,也就往往难以跳出理学家们所蓄意设置的窠臼,从而对于学术思想史发展嬗变的深层脉络的把握,未免有流于表面之嫌。因此,摆脱后世理学家如朱熹在《伊洛渊源录》中所预先设定的思维框架,对王安石为首的新学流派进行全面而细致的研究,对于澄清整个宋代



思想史的来龙去脉及其演进嬗变的深层意蕴将是不无裨益的。以此为基点,或许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宋代尤其是北宋的儒学思想,这些思想其实相当的丰富复杂而多姿多彩。

所幸的是,近些年来,学术研究的长足进展为这项研究提供了种种便利的条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著名的宋史研究专家邓广铭陆续在《略谈宋学》^④、《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中的地位——附说理学家的开山祖问题》^⑤、《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北宋文化史述论稿〉序》^⑥等文章中提出并阐述了“宋学”的概念,以取代长期以来宋代学术研究所沿袭的以“理学”或“道学”概念来指称整个宋代文化学术。邓先生把“萌兴于唐代后期而大盛于北宋建国以后的那个新儒家学派称之为宋学”,认为“理学是从宋学中衍生出来的一个支派”,“不应该把理学等同于宋学”,并将宋学的特点概括为“都力求突破前代儒家们寻章摘句的学风,向义理的纵深处进行探索;都怀有经世致用的要求”。他进一步提出,“从其对儒家学说的贡献及其对北宋后期的影响来说,王安石应为北宋儒家学派中高踞首位的人物”^⑦。一些海外学者也逐渐地摆脱了哲学派别意味颇浓的、狭隘的“新儒学”(Neo-Confucianism)概念的纠缠,开始将研究视野更多地关注于程朱理学以外的宋代其他学术流派^⑧。如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教授便指出“新儒学”(Neo-Confucianism)一词是相当含糊不清的,应当对其内涵做严格的限定;进而他用“宋学”一词来指代包括欧阳修、王安石等人在内的宋代儒学复兴^⑨。另一位美国学者包弼德(Peter k. Bol)的《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便以与程颐相当的篇幅讨论了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人的学术思想,为我们展现出北宋时期儒家思想的多元化语境^⑩。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则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系统而全面地探讨了道学的起源、形成和演变的历史,揭示出在这一过程中它与王安石变法及荆公新学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从而展示出宋代(尤其是北宋)学术史波澜壮阔的图景^⑪。这些研究不仅对于宋代学术研究者拓宽研究视野、重新选择研究视角起了推陷廓清之功,也为



比较全面而系统地研究荆公新学提供了理论借鉴。

从文献上看,荆公新学的开创者王安石的重要著述大都经过整理出版。如中华书局 1959 年点校出版了《临川先生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点校出版了《王文公文集》,中华书局 1979 年出版了容肇祖所辑的《王安石老子注辑本》,1982 年又出版了邱汉生辑校的《诗义钩沉》。《三经新义》中的《周官新义》和《尚书新义》则由台湾程元敏汇辑成《三经新义辑考汇评》,台湾“国立编译馆”于 1986、1987 年分别予以出版。张宗祥对王安石的《字说》进行了钩辑,有《熙宁字说辑》,现藏于浙江省图书馆。巴蜀书社 2001 年出版了蒙文通的《道书辑校十种》,其中也有王安石的《老子注》辑本,较之容辑本更为完备。至于王安石早年重要的著作《易解》,虽然已经亡佚,但若干佚文仍然保存在宋人著述中,笔者也已经将其辑出,附于书后。此外,清代以前关于王安石的几种重要的研究著述也已分别重印,如中华书局将詹大和、顾栋高、蔡上翔三家所著的王安石年谱汇集成《王荆公年谱三种》,1994 年出版。1959 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将清人沈钦韩的《王荆公诗集李壁注勘误补正》、《王荆公文集注》结为《王荆公诗文集沈氏注》,并附以刘承干、王秉恩的按语出版,又重印了南宋李壁的《王荆公诗注》。1993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了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在日本东京发现的朝鲜活字本《王荆文公诗李壁注》。此本属于《王荆公诗注》四库本之外的另一版本系统,既保留了宋本的原貌,又加入了元本的内容,其中保存了被刘辰翁删掉的将近一半的李壁注文,以及“补注”、“庚寅增注”和刘辰翁的评点。这些都是四库本所没有的,所以显得弥足珍贵。2002 年 1 月,巴蜀书社出版了由李之亮点校的《王荆公诗注补笺》,是书采用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影印的《王荆文公诗李壁注》为底本,参考张宗松清绮斋本和四库本,作了一些文字上的校勘工作,同时将沈注依其原序附在每首诗歌的诗句下面,并作了少许补充笺注。以上文献成果,再加上《道藏》中残存的新学门人王雱、陆佃、陈祥道、吕惠卿、刘概等人的注老、注庄之作,以及《四库全书》和《续修四库全书》中所收的王昭禹、陈祥道、陆佃、



龚原、蔡卞等人的著述,荆公新学的代表性著作也算比较完备了。这对于进一步深入而全面地研究荆公新学奠定了较为可靠的文献基础。

就论著来看,据笔者粗略统计,自1908年梁启超的《王荆公》问世以后,迄今为止,海内外关于王安石的研究专著大概共有上百部,研究论文约有九百多篇^⑫。在这些论著中,如梁启超的《王荆公》、邓广铭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漆侠的《王安石变法》等著述都对王安石的政治变革作了相当深入厚实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他如1933年出版的柯昌颐著《王安石评传》,1937年出版的熊公哲著《王安石政略》,1949年出版的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等等,也在不同程度上多有所得。当然,以上的研究论著大部分都是集中在王安石的政治变革上面。荆公新学本来就是经世致用之学,而北宋中后期的学术与政治更是前所未有的紧密相联,因此,这些研究成果也为荆公新学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只是笔者因研究领域所限,在此不再过多提及,而只对与王安石学术思想研究有关的情况予以简略的浏览。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关于王安石学术思想方面似乎尚无专著出版,研究论文也寥寥可数。虽然梁启超在《王荆公》中指出,“荆公之学术,内之在砥命厉节,外之在经世致用,凡其所以立身行己与夫施与有政者,皆其学也”^⑬,但对其学术思想并未做深入的探讨。其中较有影响的研究论文,如胡适的《记李觏的学说》,指出王安石的学术思想渊源于李觏,李是“王安石的先导”^⑭。这一观点为其后的研究者普遍接受,如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将李觏称为王安石的前驱,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则将欧阳修、李觏、王安石统称为江西学派。侯外庐等学者又拈出《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七《答王景山书》,从而为此说找到了强有力的证据^⑮。贺麟在四十年代所写的《王安石的心学》、《王安石的性论》、《陆象山与王安石》三篇文章是研究王安石学术思想的力作,他认为,“我们可以称安石哲学思想的出发点为建立自我”,“他的基本思想在哲学上和陆象山最接近”,“王安石开陆王先河的心学”,并认为王



安石区分“正性”与“性之不正”的观点“已包含有程伊川分别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说法了”^{①⑥}。贺文将研究的视角拓展到与王安石同时代的理学思想的比较上,视野开阔,论述精辟,将王安石学术思想研究大大地推进了一步。侯外庐等学者在《中国思想通史》中首次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阶级论,将王安石的学术思想划分为宇宙论、人性论、认识论等方面分别研究。此后陈正夫的《王安石哲学思想研究》一文即步武侯著,以唯物和唯心、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等术语来论述王安石的学术思想^{①⑦}。钱穆对王安石学术思想的研究则着重将其置入整个宋代学术思想史的流程中加以考察,他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如认为王安石是宋学初期、中期的转折性人物,王安石的性论吸收了佛教心性思想,并与朱熹的性论极为相似等观点^{①⑧},均发人深省,极具开拓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王安石的学术思想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涌现出一大批卓有见树的论文专著。如前面提及的邓广铭的《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中的地位——附说理学家的开山祖问题》一文^{①⑨},重新对王氏新学在宋代学术发展史上的地位、作用作一审定。他提出了“宋学”的概念以取代理学、道学等传统术语来指称宋代学术,并认为,王氏新学与关学、蜀学、理学等都是宋学发展中的流派之一,在北宋时期,理学并没有多大的影响,更没有占据学术思想界的主流地位,倒是王安石的新学影响巨大。他还讨论了王安石的学术思想与南宋以后兴盛的理学思潮之间的关系,认为王安石吸收佛、道以及诸子百家的思想来充实儒家的学说义理,他注重道德性命之说对于理学是有影响的。陈植锷的《北宋文化史述论》一书继承了邓广铭的观点,把荆公新学视为北宋主要学术思潮之一,并提出“荆公新学”在当时由义理之学向性理之学的过渡中起了主导作用,对后世影响深远^{②①}。台湾蒋义斌的《宋代儒释调和论及排佛论——王安石之融通儒释及程朱学派之排佛反王》一书着重从儒释调和这一角度,对王安石的学术思想、程朱学派对王安石的批评等问题作了深入研究^{②②}。马振铎的《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的哲学思想》和李之鉴的《王安石哲学思想初探》两书则



系统地运用现代哲学框架,从宇宙论、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历史观等各个方面对王安石的哲学思想作了阐释^②。罗云奇、吴云生的《王安石教育思想研究》则集中论述了王安石的教育思想^③。李祥俊的《王安石学术思想研究》在以上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以学术史为框架,从经学、儒学、子学、佛学、道教等各个方面对王安石的学术思想作了系统的论述^④。肖永明的《北宋新学与理学》则侧重于从宇宙论、本体论的层面,对荆公新学与北宋理学之间的同异进行了探讨^⑤。台湾夏长朴的《李觏与王安石》一书和其他一些相关论文,对王安石的学术渊源、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等各个方面都做了论述。他对胡适、侯外庐、姜国柱等学者极力主张的李觏影响王安石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在王安石文集的两个版本系统中,《答王景山书》一文字句有异,不足以证明李与王有过交往,李觏影响王安石仍然属于一个有待考证的假设^⑥。除此之外,再如李之鉴的《王安石“道有体有用”思想评论》^⑦、耿亮之的《王安石易学与其新学及洛学》^⑧、肖钢的《论朱熹对王安石新法新学的批判继承》^⑨、罗家祥的《北宋新学的兴衰及其理论价值》^⑩、王书华的《荆公新学与二程洛学在经学领域的对立与分歧》^⑪、肖永明的《论荆公新学的治学特点》^⑫、金生杨的《程朱理学与王安石〈易解〉》^⑬、杨倩描的《从〈易解〉看王安石早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井卦·九三〉为中心》^⑭、《〈易〉学对王安石变法思想的理论支撑》^⑮等文,从多层面、多角度对王安石的学术思想做了深入的研究。

当然,对于整个学术流派而言,以上研究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还存在着若干的不足。这主要表现在,这些成果绝大多数都集中在王安石的个案研究上,而对于荆公新学中的其他重要学者甚少关注。其实,新学门人虽然在当时有“模画手”、“转般仓”^⑯之讥,但绝非每一位门人都固守王安石学术之藩篱,而是对其既有继承,又不乏修订,体现出了一个学术流派正常的发展轨迹。前者如陈祥道《论语全解》卷九解“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句曰:“天命之谓性,人为之谓习,性则善恶混,故相近,习则善恶判,故相



远。”这其实是沿袭了王安石“性善恶混”的人性观。而由此我们也大致可以断定，一向颇有争议的王安石的人性论，其最终的结论恐怕未必是醇而又醇的“性善论”，而是归结为“性善恶混”。《宋全文》第35册第498页载新学门人王无咎《答王子发书》云：“《传》曰‘天命之谓性’，盖命有逆顺，则性有善恶，但善则其正性也，恶则非正性也。故性者常可以善言，而不可以恶言。以其始同出于命，而卒以习而异，故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后者则如王昭禹《周礼详解》中对“国服为之息”的解释，陆佃解《鹑冠子·博选》“王铁非一世之器者，厚德隆俊也”句为“夫专任法制，不以厚德将之，而欲以持久，难哉”等等，均是在不同程度上对王安石的学说作出了修订、更正。

鉴于此，本书在尽量全面地借鉴以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重从流派的角度，对荆公新学产生的政治文化背景、荆公新学的主要门人和著述、荆公新学的学术建构和理论特色、荆公新学在宋代的盛衰历程、荆公新学对于宋代学术思想史之影响，以及王安石的身后评价等问题予以较为系统性的考论，以期尽可能地去接近荆公新学这一北宋重要学术流派在历史上的本来面目。

- ① 朱熹《读两陈谏议遗墨》，《朱熹集》卷七十，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662—3664页。
- ②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二“记事·罢史学”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点校本，第371页。
- ③ 《宋史》卷三百二十七《王安石传》，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
- ④ 《略谈宋学——附说当前国内宋史研究情况》，《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 ⑤ 《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中的地位——附说理学家们的开山祖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 ⑥ 《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北宋文化史述论稿〉序》，《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
- ⑦ 见《略谈宋学——附说当前国内宋史研究情况》、《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